

马克思关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思想精髓 及其现实价值

于 翔^{*}

【摘 要】 马克思关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阐说,将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在人类认识自我的途中树立一座思想路标。现代社会的理性与资本联姻共谋形成的宰制力量,给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带来压抑。唯有在面向社会历史的物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还原人自由自觉的存在状态。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为守护人的自由生命本性提供了现实关照。

【关键词】 马克思;自由;生命本性;存在方式

基于不同的致思理路与解读方法,学界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深入开掘之外,还发展出资本批判、现代性批判、消费社会理论、地理空间理论等,极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时代价值。然而,无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何种阐释与创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始终是其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它指向了人的“自由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

一、马克思关于人类自我认识的革命变革

在思想史上,关于人类认识自己的“斯芬克斯之谜”,可谓诸说蜂起、歧见迭出。就算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围绕这一问题产生的分歧也不可避免。绕开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景观,我们把视线指向问题本身,则不难发现引起争论的缘由所在,即人如何认识自身的根本存在方式。人们开启认识自己的理论征程,尽管呈现不同的方法与视角,但多徘徊于认识论层面,难以上升到关于人本身的本体论高度,因而争论难以避免。马克思以“劳动”作为人现实存在的一个维度,并朝向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将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理论意涵揭橥出来。

关于人的理解,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抽象性与思辨性的过程中,提出了“现实的人”的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阿基米德支点”。“现实的人”无疑是处在一定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从事现实活动的人,也即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人。这是人类存在和开辟历史的条件,也即马克思所指出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21009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胡林翼政治思想研究”(14YJC710050)阶段性成果。

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马克思摒弃德国古典哲学的那种抽象性,将人的问题探讨从思辨的迷雾中摆脱出来,立足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生产基础上。这里的“社会条件”,实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然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人的劳动,却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大相径庭。人的劳动本应作为人自在自为的存在状态,是面向自身的自由解放而展开的,为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异化现象?是生产力不够发达吗?断然不是。就算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依托科技革命的力量,创造出了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以往一切世代”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症结无疑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地消磨了人的自由个性,使人沦为绑定在机器上从事简单劳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作为物质生产劳动的直接参与者,无时不在贪婪资本家、机器流水线、科技程式化的统治之下,遭受从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扭曲。一句话,工人阶级遭受着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理性)的共同宰制。

以劳动作为马克思观照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凸显了马克思关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理论视域,其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认识自我的基本语境。首先,“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使人成其为人。关于人与动物的区别,思想史上有着形形色色的标准,但正如马克思意识到的那样:“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②动物的活动从来都未达到真正的自由自觉,而是受到本能驱使与环境制约,因为它只按照自身的尺度和需要进行生产。相比之下,人的活动之所以是自由自觉的,乃是由于人类能够意识到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这就决定了人进行现实生产不仅仅依照人自身的尺度,还能在意识与对象性之间的关系作用下,将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也纳入进来。劳动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的关键,劳动伴随着语言一起将人类推向文明。然而,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又把人的自由劳动降低到动物本能层面。一方面,工人阶级受到饥寒交迫的驱使,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斗争,被迫接受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剥削,进行着全面异化的生产劳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工人阶级又受到现代科技与理性的宰制,不得不绑定在机器生产的流水线上,进行着枯燥简单的片面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根本无从谈起。其次,“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彰显人的现实性存在。在西方思想史上,西方思想家视野里的人的存在方式,大致表现为这么两种:知识性存在与符号性存在。普罗泰戈拉以“人是万物的尺度”为口号,将早期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目光转向认识自身,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认知,为后世的西方知识理性的发展开启了先河。这一取向在近代科学技术和哲学的推动下,以“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作为人的规定突显出来,确立了人作为知识性存在的解释立场。马克思曾对此有过评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没有意识到人是自然存在物。现代西方哲学则青睐于符号与文化,试图以符号对人的存在方式加以总体把握;而康德虽然看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认为“人是目的”,但“康德唯心主义的立场导致自然目的论视角下的历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③。由此,无论是人作为知识性存在还是符号性存在,其实都殊途同归——抽象地理解人的存在方式,而没有意识到人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性存在。实际上,马克思早已发现,“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且“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以“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来规定人的现实性存在,无疑超越了以往人们对此作出的片面理解,并进一步加以指出这种存在方式就是物质生产实践。在谈到意识和存在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提及,意识只是人们在脑海中反映出来的存在而已,“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④

①②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67、30页。

③刘凤娟:《康德“人是目的”思想的系统建构与批判》,《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足点,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以建构的基础和前提。如何在理性压抑模式中恢复人的感性生命,马克思早就为我们给出了解答。倘若原本具有理性的人却反过来听凭理性的统治和安排,那么,人类将不会掌握生活本身,因为那样的话,人的存在与生活不是为了自由而全面发展,而仅仅是为了抽象的理性,即生活的目的存在于人的本身之外,最终将沦为人的生活必须要遭遇的某种负担和外任任务,成为人的自由生活的“枷锁”。

二、现代社会中人自由生存的时代处境

一旦人的感性生活从抽象思辨的迷雾中走出,自由自觉的活动遂成为人的生命本性。在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人类既是理性的受益者又是受困者。人类获得理性的最初本意,就是为了在改变世界中不再处于受动地位,以积极姿态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目的是在生存与发展中获得人的自由个性。然而,在理性与科技主导的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却时常处于压抑之境地。

在理性还作为人类改造世界的启蒙之光时,人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纯然被接受的价值观,它们与世界存在的真实图景也基本吻合。工具理性的发展,功利化思维的存在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理性不再仅仅表现为人们最终追求的价值本身,还表现为在追求价值过程中的形式和手段。人们对效率和一致性的考虑将不再受到一套给定的实质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制约,更有甚者,这些规范本身,反过来还要受制于在达成选定目标和最终价值时表现出来的效率和一致性。这种情况表现在人们的社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导致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总是受到束缚。

朝着人类本来的生活目标追求,摆脱那些纷繁复杂的外在的形式化限制,是人们获得感性生命的有效形式,要抵抗强大的理性统治,就必须真正把握自身现实的感性生活。然而,人们试图在生产与生活中突破必然、达到自由的美好意愿,往往在现实社会中受到打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到处面临着矛盾和困惑,原本统一的概念如今却面临着分裂,如速度与效率、感性与理性等,尤其是商品、货币、数字、资本、效率等统统成为“神”,并且与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感性生活是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人们或是出现愚昧无知,或是沉溺痴狂,或是机械重复,都证明了人类发展的不充分,还没有达到全面发展才出现这些问题。这一切,与现代社会理性化思维的专业社会分工不无关系。最典型的分工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分工,带有固定性和强制性。当一个社会中产生了私有制,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制性社会分工时,社会必将分裂为许多阶级,这些阶级最终又在生产活动中简化为两大对立阶级。就算是在两大对立阶级内部,由于人类活动的历史必然性结果,也还是存在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人们的活动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边界,这一边界是社会分工所强加的。马克思也强调个性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①。在这种情况下,精致细化的社会劳动分工,整体上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对于追求自由个性的人类而言,无形中划定了一种受限制的生活方式的框架。某种程度上说,“隔行如隔山”并不仅仅是人们的谦虚表达,而是现代社会生活壁垒的真实写照。马克思曾指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②可见,正是分工使得感性的人、现实的人走向片面化和畸形化。

有鉴于此,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去剖析引起人们在身体上不自由、在意识上

^①葛春娱:《马克思的人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4页。

被统治的原因,以此去重新激活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在深受理性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相信理性的发展最终会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理性的自我发展中将会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自我克服,实现否定之否定这本身也是一种理性的逻辑怪圈。相比之下,辩证法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性的迷信,使人敞开“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辩证法要向人们敞开世界的本来面目和意义,使人们“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①。

长期以来,人们不自觉地生活在一种理性的承诺之中,面对当今社会所遭遇的各种问题,总是相信理性的发展会给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甚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人们可能也会抱以某种误解,认为未来对我们有个承诺,现在的艰难困苦都是值得的,社会历史有朝一日会将我们带入那个令人向往的“自由王国”。然而,由于个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境遇以及个人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人们很快又从这种虚幻的许诺之中回过神来。毕竟,在有限的生命存在中,如果说存在什么永恒意义的话,那么,它意味着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把握和追求,并存在于当下切切实实的行动之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失落的总体进程中,人的感性生命在资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宰制中受到压抑。具体而言,人原本具有丰富的感性生命,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及的那样,但在“商品”这个精灵的中介作用下,人的这些感性生命被全面地放逐掉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内在追求,则完全沦为只满足生存所必需的条件,而创造剩余价值,成为工人阶级唯一的社会作用和存在理由,也成为资本家唯一的追求。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劳动的两个基本因素规定的,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是商品在市场上交换所依据的标准,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反映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劳动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和对象性活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它反映了人们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劳动的二重性。总之,在商品的中介作用下,使用价值和价值发生对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发生对立,结果只能是人的感性存在与社会存在之间也发生对立。

无论在何种社会条件下,人们所展开的生活过程本来就是现实的,从事一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本质也是为了使生命本身表现得更加丰富,毕竟,“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在“必然王国”中追求感性生命的实践,仍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依然“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三、守护人自由生命本性的现实关照

当抽象的理论关注具体的社会现实,就需要我们对当代社会人类发展状况做出回应。正是科学的思想理论不断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才得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中持续在场。而关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最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无疑将这一理论形式所关注的议题不断推向当代。

在以“中国梦”为价值引领,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努力使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内化为我们党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诸多举措:如实现小康社会,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深化改革,为人民带来具体福祉;全面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等等。“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③,遂被习近平同志认为是我们党一切工作成效的检验标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一刻也离不开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17—418、30页。

^③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只有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所需,使其不再为生存所困,同时为其全面发展自身努力创造条件,才能激发蕴藏在人民内部的巨大活力与能量,真正从具体实践中践行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积极为人民群众创造出看得见的实惠。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民生工作,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好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②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定各项明确指标。无疑,这是我们党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生命本性的积极实践。倘若人民没有实现富足,总是在贫困线上挣扎,那么自由自觉的生命本性根本无从谈起。同时,要真正造福人民,实现能使人达到全面发展的社会状态,就必须深化改革。朝向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需求,我们党推行的改革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方面,这些改革的持续进行旨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人民从富足走向文明。2015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将改革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③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核心,我们党自身的建设被提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地位。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强调党的建设,在“四个全面”的指导下从严治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党的人民性。所有这些举措,无不指向人民群众这一历史创造的主体。毕竟,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积极开掘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宝库,借助科学理论来为具体实践提供指导。马克思关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思想所指示的价值,尽管受到现代社会具体的时代处境的抑制,但在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渐获得现实性。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要使人民从物质需求的受动性中解放出来,也要为人民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不断激发劳动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内在地开展马克思关于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现实关照。

(责任编辑:杨嵘均)

Essence and Practical Value of Marx's Thoughts on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ies”

YU Xiang

Abstract: When theorizing on the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Marx took the concrete activitie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s a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us established a signpost to the self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ings. The marriage between rationality and capital dominates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imposes great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ies of human beings. Only in the practic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n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can the free and conscious state of human existence be restored. Our party'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fforts in the new era provides a guarantee of free life for human beings.

Key words: Marx; freedom; essence of life; state of existence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③习近平:《科学统筹重点对准焦距 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人民日报》2015年2月28日。